

## 編輯室報告

曾秀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本期專題為「性別與台灣文學、文化」，有三篇精彩的專題論文、兩篇一般論文，另有兩篇書評、研究紀要也對性別研究有不同的反省與思考。舉凡在日常生活、文學藝術、影像媒體、文化歷史，乃至風起雲湧的社運當中都有各種值得探討的性別面向；性別政治滲透各個層面，從個人的瑣碎日常到國家體制的龐雜運作都可見到性別因素或隱或顯的作用。如此說來，性別課題應有其普遍性，但在當今教育界與學界之中仍常被視為「特殊性」的存在，因而當國中小想要推廣性別教育、同志平權時會受到公開的阻撓；在學界各領域中，性別學科的建制化往往也歷經艱難的過程。而如今當性別／同志研究逐漸蓬勃，便常聽到有人認為：「性別／同志研究在台灣已經從『險學』變成『顯學』了」，但情況真是如此嗎？

這類的話語固然也反映了性別研究增長的趨勢，卻也可能隱含了學術位階高下的價值評斷，暴露其對性別／同志研究幽微拒斥的心態。此話的用意通常並非鼓勵性別研究的發展，而是隱約流露出一種微酸諷刺的心理和另眼旁觀的姿態，性別研究被視為一種「趕流行」的「風潮」。(但若是趕其他理論、研究風潮好像就比較沒問題?)這種對性別研究「喻貶於褒」的話語，其實暴露了隱微難辨的結構暴力與學術偏見，也代表了自詡為開明中立的學界其實仍存在著一種詭譎曖昧的意識形態與優劣等差的研究階序觀念。(不妨試想，旁人會用同樣曖昧的語氣對著國族／歷史研究者說：「台灣國族／歷史研究已經從『險學』成為『顯學』」嗎？——雖然這情況實在比性別／同志研究更為顯著與主流。)

也或許是性別研究的生猛，擾亂了現有結構的既定框架，才會挑動某些觀察者的敏感神經，讓其不得不另眼相看，卻又隱隱不安。而這種質疑／毀壞主流體制與反思的力量，正是性別研究在當代台灣非常重要且珍貴的資產。不過，雖然性別研究已累積了豐厚的研究成果，甚可自成一家，但如此良好的「績優股」，在既有的學術體制中仍常在不同學門、領域中被視為「可有可無」或「聊備一格」的學科／學問；換言之，這仍然是一種「被特殊化」的存在(因此也可以被輕易取消)。因而可以看到某些學問與方法在該領域中被視為優位而存在，具有「普遍性」的重要基礎，但性別理論與研究卻被「特殊

化」與邊緣化。然而如果說國族、種族、階級、社會、結構、哲學等分析具有其普遍性基礎，難道性別分析不是嗎？但這樣說並不代表性別研究就要去競逐普遍性的位置，而是想進一步思考，所謂的「普遍性」是否也可能是在特殊脈絡下所建構的產物？眾人習以為常的國族、種族、民族等主流敘事與論述是否也可能是一種特殊性的存在，卻透過各種方式被「普遍化」與「自然化」？如何透過不斷反思的力量，來打破中心／邊緣等（學術）位階，如何持續從性別研究的視角出發檢視各層面（包括學術界）所存在的權力部署與政治角力，至今都仍然是個重要且必要的課題。

因而本期以「性別與台灣文學、文化」為專題，收錄三篇具有開創性的論文。首先，蔡佩含〈想像一個女獵人：原住民山海書寫裡的性別／空間〉試圖回應一個問題：在強烈彰顯男性主體的原住民山海書寫中，是否有女作家、女獵人的位置？本文深刻反省原住民文學多以山海／傳統／男性／狩獵為主的書寫範疇，是否複製了二元對立的性別分工？女作家又如何在受限的文學典範中突圍，展現出不同的原民空間想像與身體經驗？作者認為原住民的文化傳承不該只是一種傳統的回歸，更要考慮如何在現代社會裡延續。文中指出原住民女作家迥異於男作家的兩種書寫策略，一是追溯母族的歷史性時空，二是以「出走」與面向現實的姿態，藉由空間的「離」來成就原鄉的「返」。原住民女作家的書寫及「都會女獵人」的存在，提供了另一個「獵場」與原住民空間，開拓了原住民文學的領域與視野。

第二篇為王鈺婷、陳育民所撰述的〈台灣同人誌文化中的耽美想像：女性閱聽人的性別意識〉，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試圖釐清喜歡觀賞 BL（男男之愛）的女性閱聽人如何思考相關性別課題。兩位作者認為雖然受訪者未必明言自身具有女權意識，但從訪談內容與其觀看男女性別的角度分析，這些女性都透露出對於女性身體政治的主導欲望，透過閱讀與創作的想像來抵拒父權結構對於女性欲望的控管。而對於 BL 的耽美想像並不妨礙她們對於現實的理解，亦即能區辨二次元（虛擬文本）中的 BL 愛慾與三次元（社會現實）中同志族群的差異。而即使這些女性閱聽人並不因此就特別關注同志議題或人物，但仍有助於以更開放的態度看待多元性別的情愛與欲望表述，也能增進其對相關議題的敏感度。

第三篇蔡孟哲的〈愛滋病毒、派對藥物與酷兒壞情感：《愛我就趁夏天》的「毒／藥」政治〉一方面分析台灣愛滋治理的背景與變化，批判當局往往透過公衛醫療、司法警政、社工體系等方式將用藥同志與愛滋感染者污名化；另一方面更主張同志（文學）研究應更為積極地介入愛滋論述，以酷兒政治的立場發聲，打開性藥／派對研究的另類空間。而同志（通俗）文學正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潛力，文中以《HIV 教我的事》與《愛我就趁夏天》兩文本的愛滋書寫進行比較，並指出第一個文本的主述者內化了愛滋污名，

並以懺悔式的敘事獲得救贖；而第二個文本雖也有類似的救贖主線，卻在副線中撐開了另一個多義曖昧的空間，展現了另類的性藥親密關係，以及由感染者所共組的照顧家庭。但他也懷疑這種的另類照顧倫理與多元家庭是否能被主流同志社群所想像與接受？該文認為如何能哀悼酷兒（壞）情感與挫敗，去探索其他的倫理可能，是男同志社群無可迴避的重要課題。

本期除了三篇專題論文外，還有兩篇精彩的論文。王惠珍的〈文學地景的想像與重構：以跨時代作家龍瑛宗的故鄉書寫為例〉分析龍瑛宗在不同時期對於故鄉北埔的書寫。文中指出在戰前龍瑛宗的文學地景充滿熱帶神秘風情與鬼魅氣息，成長於鄉下的知識分子雖嚮往殖民現代性，卻又不得不屈就於傳統家庭壓力，總在離鄉與否的抉擇中徘徊，因而與故鄉存在著緊張關係，北埔遂成爲一個帶有鬼魅氣息的殖民地景。到了戰後作家克服了語言難題復出後，故鄉則成爲他重構歷史記憶的重要場景，個人成長、家族歷史、客家族群的墾拓、抗日等重層歷史敘事成爲他重構北埔歷史和地方感的重要題材。龍瑛宗對於故鄉北埔所展現的跨時代書寫，顯示了他在戰後雖對文化中國仍有嚮往，卻也與故鄉的記憶及情感並行不悖，既回應了本土化的浪潮，也呈現了個人認同的複雜層次。

而在〈邊走路邊跳舞的自由夢境：李魁賢散文詩研究〉中，戴華萱認爲李魁賢散文詩乃在散文與詩的跨界之外，進一步結合小說手法進行文體的越界，展現了戲劇的效果。其主題、風格也不同于李魁賢在批判社會現實的分行詩中那般沈重嚴肅，他的散文詩著重對自我生命的哲思與觀照，增添了抒情的意象，彷彿跳舞般優雅。在散文詩中各文類彼此跨越無礙，如同走路般地輕鬆自在，也成爲李魁賢以邊走路邊跳舞妙喻散文詩的具體實踐。

此外，本期還有兩篇相當珍貴的稿件，一是由陳雅瀟所撰寫的女性主義書評，二是由紀大偉所撰寫的「研究紀要」：〈身心障礙，科技，文學〉。陳雅瀟書評乃是評論由劉禾、高彥頤、Rebecca Karl 所合編的《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一書。書評雖肯定該書對華人女性主義文獻翻譯的貢獻，卻也質疑美國學界對於「華人女性主義」的想像與侷限。文中尤其以台灣的立場批判國外學界多半將台灣置於中國的大傘下，完全忽略台灣獨特的殖民歷史、文化背景。本書雖以「華人女性主義的誕生」一詞來宣稱其開創性，卻完全無視於同時期中台灣多位優異的女性平等實踐者。因而文中反覆叩問：這個「華人女性主義」的意涵爲何？包不包括台灣？是否涵蓋非異性戀者？書評的質問鏗鏘有力，提供了一個犀利的閱讀視角。

而紀大偉的〈身心障礙，科技，文學〉從身心障礙、科技與文學三者的角度出發，思考三者組合或矛盾的可能狀態，同時也對照了「同志文學」等分類範疇提出建議。他

認為這些易被標籤化的次文類應避免「櫥窗式」的展示型態及「對號入座」的閱讀傾向。因為太過輕易的「身分認證」反倒容易落入刻板印象與模式，忽略了文學作品中豐富的面向與可能的線索，然而曖昧性與模糊性不正是文學可貴之處嗎？此文反省了身分政治與文學閱讀的張力與危險，更提醒身心障礙研究、同志研究須將過去習於關注「個人」的傾向轉移到關注「社會體制」的結構面向，探討究竟是怎樣的「體制運作」造成了「障礙處境」。而科技的演變又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與身心障礙有怎樣的連結？此文提供了諸多教學、研究與閱讀上的反思，並期待激盪更多關於身心障礙、科技與文學的想像。